

鄞州区镇(乡)、区级机关党委中心组

优秀理论文章与调研报告

选 集

王国定 主编

(2002年度)

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宣传部

鄞州区镇(乡)、区级机关党委中心组

优秀理论文章与调研报告

选 集

主 编：王国定

副 主 编：朱剑辉

郑贤斌

责任编辑：胡守南

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宣传部

目 录

关于我区行政区域分割与整合的对策思考	
..... 区人大中心学习组 (1)	
协同推进村级党建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 组织部中心学习组(11)	
加快文化大区建设的构想	宣传部中心学习组(23)
进城务工青年的发展现状及对策.....	沃勇特、胡光飞(29)
关于撤县设区后经济发展战略与目标定位的探讨	
..... 虞忠芳、陆静波(39)	
新阶段鄞州区农业结构调整思路、对策探析.....	朱立余(51)
关于鄞州区基础教育现状、发展目标和思路的调研报告	
..... 教育局中心学习组(60)	
关于今后五年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情况的调查报告	
..... 国土局中心学习组(71)	
近郊型乡镇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蒋明良(80)
以利时经验为导向,扎实推进全镇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 徐源忠(88)	
关于撤县设区对鄞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 鲁宝明(96)	
关于我区外来流动人口学龄儿童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	
..... 郑诗振(105)	

关于城郊结合部社区建设的思考	施孝峰(114)
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快提升工业化步伐	孔庆达(121)
关于鄞州区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裴渭干(128)
关于鄞州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调研报告	任淑芬(136)
关于运输管理中无证黑车的成因及整治对策的探讨	交通局中心学习组(144)
正确把握现状,突出预防化解,努力创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鲁定国(151)
邱隘镇应对宁波城市东扩的目标定位与思考	邱隘镇中心学习组(163)
创新投融资体制,做足做好城市经营文章	李成康(169)
我区高素质人才引进培养的现状及对策措施	章国荣(178)
关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的调查和思考	陆瑞康(184)
对近郊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一些看法	钱国华(191)
鄞州休闲旅游业发展机会与策略初探	卢世泽(200)
明伦村旧村改造工作的启迪及我们的思考	李波(209)
论县级党报兴盛的社会基础	戴松岳(216)
当前我区订单农业发展情况及对策建议	张旦(224)
完善村民自治,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若干思考	陈虹(231)
浅谈提高区级政府的行政效率	忻国龙(255)
浅析村民自治框架下乡镇与村的关系	冯浙萍(264)
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严朝阳(272)

关于我区行政区域 分割与整合的对策思考

区人大中心学习组

一、当前我区区域分割的现状及隐含矛盾

随着撤县设区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区原有的利益格局体系将被打破,一些固有的矛盾也提前暴露,特别是以镇乡为主干的行政区经济调控模式正在逐步减弱,其发展腹地过窄、调控力度过小的弊端不断显现,并影响着新一轮区域高地的发展。仅从东钱湖到中心区的核心地带内,就已出现了多种体制、多样模式、多层管理的区域混杂和分割现象,由此引发的行政区与行政区、经济区与行政区、街道管理模式与农村管理模式的矛盾也在逐步扩大。目前,我区这类非行政性的区域性高地,主要有三大类型:

第一类是经济性发展区。如区工业产业园区(包括正在规划的明州工业产业区、栎社工业产业园区),它是由于招商引资政策的诱导、城市企业腾笼换业和区内某些优势企业扩张的必然结果。

第二类是专项性发展区。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高教园区、中心区,它是借助于特殊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在强行政行为的驱动下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类是社区性管理区。如宋诏桥管理区,它是在新一轮城市化发展中,因土地征用和城区扩展,对原有农村社区进行改造或重建而出现的“准街道”模式和新型社区居委会。

由于上述这些新的区域性高地基本上都依附在原来镇乡区域内,而撤县设区后我区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并未改变,导致了行政

区与经济区的不同一性,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行政分割、结构重叠、管理交错、利益冲突等迹象。具体表现为:

一是规划冲突。主要表现为:总体规划悬空,分区规划频繁,专项规划脱节。区域内现有的规划仍在沿续镇乡行政区划格局,没有充分预计城市东扩、县域体制变化等非正常性因素,特别是对原以各区公所所在镇为中心的自然区发展模式出现的新变化应对不足,静态谋划多,前瞻思维少,导致区内交通、水利、电力、排污等基础设施规划和文化、教育、卫生、商贸等配套设施规划与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不相一致,局部性的基础功能萎缩和中心地位衰落现象逐步显现,一些规划处于不断修正状态。同时,在撤县设区和东钱湖体制变化后,又过多地考虑了经济中心的转移,没有全面把握区域整体布局和持续发展的关系,试图用最短的时间来促成特定区域的快速崛起,但在宁波城市总体规划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些区域规划仍处于一种被动转换的不稳定状态。2000年编制的县域总体规划,实施还不到两年,就被区内过多的专项性区域规划所冲破,且与即将推出的宁波城市总体规划冲突较大,特别是工业园区地块,是未来宁波新城区的核心地带,其作为工业布局的范围至今尚不明朗,对其今后如何发展将是一大阻碍。而区域内不断扩大的功能区划也与宁波城市总体规划存在衔接上的问题。如中心区规划面积已从33平方公里扩展到80平方公里,区工业园区也达12.3平方公里,正在论证的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明州工业园区等概念性规划“手笔”更大,新一轮的中心镇规划和鄞东、鄞南、鄞西等重点镇级工业园区的规划也将进一步扩展,这些从内部突破的区域规划早已使县域总体规划形同虚设,而且还将进一步受到宁波城市规划的制约,一些近郊镇的区位优势正在变成劣势。而这些规划又都集中于我区环城市的核心地带,涉及多个镇行政区,且各规划之间又都自成体系,导致了部分规划与规划之间因先后时序问题交错重叠,由此还可能引发市、区、园、镇之间的利益交

割。如原东钱湖镇域范围内的区工业园区二期开发地块就出现与新的东钱湖旅游度假区规划北端重叠(约 1000 亩土地),如何处理这一地块的规划与开发问题(由谁规划? 由谁开发),不仅涉及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和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的整体形象,还关系到整个工业园区的资金平衡问题。

二是政策冲突。主要表现为:历史欠债较多,创新空间狭窄,前清后返矛盾突出。现有的政策界面由于介入了撤县设区这一体制环境而变得复杂起来,并使我区陷入到变与不变的两难境地。一是如何解决体制变化前后原有政策的连接与冲突? 特别是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处理,在县、区体制转变前后如何妥善衔接? 若维持老政策将难产生新的推动力,重新拟订新政策又可能导致旧政策的反击。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可能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如我区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房屋拆迁赔偿、最低生活保障线以及交通、通讯等政策,都与市区有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受市区波动的失土农民养老保险政策、职工医保改革、住房货币补贴等政策,由于历史欠债较多,区位环境复杂,不太可能与市区完全接轨,这就很容易引发群众心态的失衡。一旦某一政策处理不当,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线,特别是近郊镇和各大园区必然首当其冲。二是如何协调全区总体政策与区域局部政策的矛盾与冲突? 目前,我区核心区域的“开发区化”现象日益突出,市、区、镇各工业园区之间事实上已成为一种竞争伙伴关系,尽管初始规划对其各自的功能必然作出清晰地等级差异界定,但随着招商引资的深入,这些以邻为壑的园区的最初分区和定位,迟早也会被打破,各镇乡、各园区之间争项目、争税源、争政绩势在必行,拼地价,随意承诺优惠政策措施也在所难免。最突出的问题将是土地政策处理,一方面各镇乡和园区都把土地作为引资的“绣球”,以低廉的价格引进外资、科技项目,甚至负债向各利益集团倾斜;另一方面又把土地作为“聚财之盆”,极力推崇经营性土地拍卖和

争取房地产税收的“双赢”之策。但由于利益关系未理顺、分配机制欠完善、拆迁政策不统一,可能会直接引发农民的逆工业化、逆城市化心理,致使土地征用和农民就业安置政策的不断反复,并将始终困扰园区建设和发展。

三是体制冲突。主要表现为:多种体制混杂,管理权属交错,执法出现盲区。目前从东钱湖到中心区的多种混杂体制,主要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地域属区、管理归市”型,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市高教园区,其性质属市级管理机构,开发主体是园区管委会,我区主要是做相关配合工作;第二类是“地域在镇、管理归区”型,如工业园区、中心区,其性质与第一类相似,属区级派出机构,开发主体是园区管委会,涉及镇主要是做相关配合工作;第三类是“地域在镇、区镇共管”型,如宋诏桥社区管理区,其性质是一种城市街道的过渡形态,主要职责是社区管理,不涉及经济开发,既有区派出机构成份,又与所在镇存在某种隶属关系。这三种类型并不是一级行政区,但因涉及到市、区、镇三级管理权限而变得复杂化。一方面,市与区、区与区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对房屋拆迁、道路延伸、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布局和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其所涉及的利益分割和管理权限问题会更加突出,一些本应由城市承担的社会管理责任可能会强制性地转嫁到我区和相关镇政府头上,由此造成的矛盾和问题也会接踵而至。如高教园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由于其相关行政职能残缺,社会管理责任与区域执法功能背离,一旦这一矛盾长期化,甚至可能发生法理上的冲突。另一方面,因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的重叠、交错,区域内部矛盾也时有上升,中心区与三镇的利益分享和管理权职问题,邱隘镇与梅墟工业区、工业园区与下应镇的体制问题,实际上都是一种非正式的、变相的城乡混和体制。新设立的宋诏桥管理区与宋诏桥村更是这种体制混杂的典型,乡街交叉、农居混合、管理分离的现象将不可避免。这种体制格局如果长期延续,势必对区域发展产生负

面影响,并将导致区域矛盾扩大化。

四是资源冲突。主要表现为:基础资源瓶颈突出,潜在矛盾有所扩展,预期制衡逐步显现。我区综合位次和发展水平尽管分列第16位和第14位,但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却分列第112位和第652位,这也说明了我区稀缺资源有提前释放的迹象。特别是土地与水资源的瓶颈问题更是未来区域发展的一大“瓶颈”。以土地为例,全区目前可用耕地约为55万亩,但以正在实施的园区规划面积看,就已达到了300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区和工业园区约合100平方公里,明州工业区以及几个重点镇级工业园区,规划面积也达2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需用地45万亩(撇开土地行政审批手续问题),全区“开发区化”势头将难以阻挡,而且现有的一些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也面临着被快速发展的工业项目所侵吞的危险。同时,以地价为核心的竞争手段将更趋“花样翻新”,特别是城区土地的价值长期被低估,土地收益流失和非法侵占现象可能会更加严重。而各园区滚动发展的着眼点又都落在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上,其所谓的滚动开发实质上是“炒地皮”,搞变相的“圈地运动”,以丰补歉。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萎缩和泡沫,就有可能影响资金的占补平衡。与此同时,水资源的制约危机也已显现出苗头,“开发区化”必然加剧水环境污染,水资源匮乏的短期矛盾将难以避免,至今我区仍有一半以上镇乡在吃河网水。而潜在的水源却比较紧张,市属周公宅水库的建立,将分流相当一部分皎口水库的水量;鄞东南排涝工程,又将使我区核心区块深受区域分割和泄洪通道的双重阻碍;东钱湖体制的变化不仅使我区丧失了一个潜在的资源和品牌优势,而且以旅游为主要特征的管理模式,还将影响周边镇乡的用水安全。此外,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和各自为政的布局特点,也将严重制衡区域经济的发展,后续矛盾会更大。

二、我区区域整合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从东钱湖到中心区,这是我区整个城区体系的中心和枢纽。鉴于目前这种园区经济与行政区经济并存的现状,迫切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经济区”与“行政区”这种双重调控模式具体化,并深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设想,既避免割裂各区域之间内在的关联度,又防止行政区之间的勉强拼盘,为未来行政区的整合奠定基础。

一是加快“西进”。东钱湖管理体制的快速变化,表明了市委、市政府筹谋大宁波的战略思维,未来三五年内,更多更大的“手笔”工程还将可能在我区展开,区域辐地完全有可能再次发生裂变。为此,必须理清思路,调整方向,创新方法:①实现指导思想的新转变。要突破原来梯度发展的惯性思维和以镇乡为单体的固有模式,坚持从全区整合的高度来筹谋发展的新思路,适当调整战略重点,强化基础设施布局的东西兼顾,加快推进城镇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战略,做好做实区域发展的覆盖面和纵深化文章,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缩小与市区的差距,完成与老三区的接轨。②确立勾勒区域发展的新概念。要依据各镇乡“经济地理”和产业特色、经济流向、人文环境等因素入手,妥善处理全区经济形态和空间形态的关系,筹谋和设计“板块经济区”,并制定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方案。如可考虑设立中部核心经济区、西部生态发展区、沿海特色经济区、新兴旅游发展区,甚至可依据我区独特的区位优势 and 自然环境打造乡村 CBD。在此基础上,要深刻吸收鄞江古镇被破坏的历史教训,对旧镇旧村改造中有保护价值的住宅、建筑必须完整地保留下来,以体现未来城区的文化品味。③完善区镇连动发展的新机制。要超前研究城市化发展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增强有关政策的预期度和平衡性,并建立对危机和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极力减少广州、深圳等地在农村向城市转轨过程中重复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同时鉴于现阶段我区园区经济、行政区经济双向运行的特点和镇乡之间区域功能层差不断扩大的现

状,可建立多层次的考核体系,进一步加大区域之间协作性目标的考核份量,改变现行考核体系和运作机制固化行政经济区的弊端。

④推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高地。针对近郊镇受城市规划控制、增量发展潜力不足的现状,积极顺应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向我区延伸的发展态势,趋利避害,着力开辟我区西、南两翼新的区域高地,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栎社工业产业园区、鄞州工业产业园区、明州工业产业园区等市级工业园区在我区的有利条件,加快新兴产业链的培育和建设,加大实施相关产业转移的力度,允许并鼓励区内外成长性、扩张型企业向新的园区流动与集聚,减少政策的非国民待遇,为企业实施“腾挪”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

二是规划对接。在撤县设区之前,鄞县还只有12个镇纳入在宁波城市总体规划之中。随着撤县设区,这一状况已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区成建制地并入到宁波市,从法律意义上讲,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规划权。特别是随着东钱湖体制变化和鹰龙山发电厂建设,横溪、云龙、塘溪等地的规划也将随之纳入到城市规划之中,栎社机场二期扩建、绕城高速公路横贯我区,又使得这些连接点镇乡进入到城市控制区内,这种规划控制区域不断扩大化的格局,实际上已使我区无“规”可“划”了。为此,必须正视现状,及早筹谋,作好应对:①充分吸取原来县域规划匆忙推出的教训,深入研究我区作为城市分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特别是在整个城市总体规划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必急于编制鄞州区域总体规划和城乡一体化规划,而是要充分利用这段期间规划的“空隙”和“松弛”,理清并理顺我区与东钱湖旅游度假区规划、栎社机场二期扩建规划、鄞东南排涝规划、高压变走廊及绕城高速、甬金高速公路等市重点工程规划之间的关系,尽快制订好区域内的工农业园区及相关基地布局规划、生态绿化规划、路网整体规划、供水专项规划、居住区域规划,并多从本位利益考虑,积极向市里据理力争,率先在某些重点地块进行突破,赢得发展主动权和时间差。②重视研究全区“开

发区化”带来的新问题和矛盾,抓紧做好各园区基础设施总体规划的衔接工作,改变各园区之间各自为政的分割式做法和单一的行政投入型开发模式,特别是对核心区块内的供水、排污、电力、通讯等一些基础设施的配套必须坚持区域一体化,并适度超前,避免再出现中心区与工业园区排污管道口径不对等问题。对工业园区与未来的明州工业园区以及几个重点镇级工业园区的关系要作合理的定位和分工,明确各自特色,防止因过度竞争出现“此起彼伏”的现象。③加快区内社会事业布局的有机整合,根据各镇乡现有社会事业布局状况,坚持从整个区域发展、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自然流向加以整合,适度撤并,强化特色,做好品牌,重新制定区域性的教育、卫生、商贸、居住等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形成相对的区域集聚中心,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三是中心过渡。当前重点要抓好两块:一块是以中心区为核心的城区体制框架如何搭建?特别是明年行政大楼搬迁以后,意味着新的区域中心开始运作,但目前“一区三镇”的行政分割格局极不利于中枢功能的有效发挥,必须根据城区功能扩展和区域资源共享需求,有选择性地寻求区域行政体制变革的可能性,拟订具体的整合方案,以符合新城区建设和管理的需要;另一块是以扇形布局的区域性中心如何构造?全区开发区化和中心镇的构建,使得区位优势已明显优于行政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镇乡的调控功能,并为构建新的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但下步如何实施资源共享、行政粘合仍需一定的时间。为此,必须突破陈规,依势而动,加快整合:①在区行政功能转移后,要抓紧做好新城区核心区块行政体制与城市体制的对接融合,有条件地对“三镇一区”权属关系进行组合调整,并加紧做好这些地段内撤村建居、撤镇建街的准备,理顺由此引发的市、区、镇、园区和村、居之间的职能交错和管理重叠问题。如可考虑在这一区域内设立2-3个街道,把钟公庙、下应两镇和石矸镇部分的镇级功能剥离,并与现宋诏桥社

区管理区、中心区的管理职能粘合起来,以保证这一核心区块的城市构建。对这一区块内的新建居住小区、条件成熟的无地村一般应就地改造为居委会,并归并到相应的街道。对邱隘、梅墟等已与城区粘连的镇、区待条件成熟时,也可考虑设置为街道模式。②以中心镇为中心,重新调整和配置行政功能,搭起未来新一轮撤镇并乡的行政框架。随着新城区的框架逐步搭起,要把城市化的重点及时转到扶持和培育咸祥、鄞江、集仕港、姜山等4个中心镇的功能上来,促使周边镇乡向其进一步集聚,使其逐步成为区域性中心。横溪镇因可借助东钱湖开发和原有的区位条件等优势,建议重新归入到中心镇序列。同时,鉴于新一轮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姜山、洞桥是作为城市工业卫星镇定位,高桥、集仕港、古林、五乡等镇是作为城市外围城镇定位,我区也要及时调整相应的政策目标,既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加以整合,又要筹谋边缘镇乡的发展定位,使得在未来几年内全区镇级设置缩减到8-10个,以加快区域间协调发展。

四是综合试点。鉴于下半年全区的重头工作是换届选举,为保证社会和人心稳定,现阶段暂时还难以马上开展行政区域的整合,但可以着手开展调研,拟订方案,并先行开展某些局部性试点,以探索新的城市构建模式。为此,必须组建班子,综合试点,摸索经验:①选择有代表性的镇、村进行综合改革试点,试点内容可包括撤镇撤村、政社政企分开、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新型社区经济组织、转居安置等。如对已经没有土地的村,其名义上存在的行政村应改村委会为居委会,并按居委会的模式运作,其原有的集体经济性质可不变;仍保留有一定土地的村,可参照居委会的管理方法,使其逐步过渡到居委会;辖区内有成片开发小区的镇,应视小区居住的人数,成立居委会。②在继续完善宋诏桥社区管理区的基础上,可在其他条件合适的地区先考虑成立街镇社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编制本街镇社区发展规划,组织管理社区工作队伍,协调处理社

区管理中的突出矛盾;对新建的小区,其社区管理中心应以新建立的居委会为依托;在暂未动迁的地区,可跨自然村界成立社区管理中心,使那些正在转为城市居民的原村民们慢慢接受“社区”这一新观念,并在居委会领导下建立居民小组,实行自我管理。在这些试点中,重点要解决好以下问题:(1)集体资产处置。可以产权为核心,从清产核资入手,依据政策,明确镇村集体经济产权,实行政社政企分开,建立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克服目前集体经济产权不清、所有者缺位、监督不力、资产流失等问题,并避免平调集体积累的资产或因简单分割集体资产而出现种种矛盾。(2)基层政权建设。围绕改善体制,进一步理顺区与镇乡(以及将来可能设置的街道办事处)政府的权责关系,处理好不同行政建制在转型过程中的顺利过渡和衔接。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镇乡建制和街道建制并存地区,要及早筹划,界定两者的职能分工和财政经费来源,明确产权关系。如分别建立街、镇财政;对那些由集体经济利润负担区域行政经费开支的,应明确其数额,并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3)转居农民就地安置。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宁波市即将推出的被征用土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研究制订我区土地征用资金分配、失土农民就业和收入来源等相关实施细则,并切实解决农民转居后的养老、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保持未来我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速度。

协同推进村级党建 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区委组织部中心学习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扩大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党的统一领导和依法办事，是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必须坚持的两条基本原则，正如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重大原则。”“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动摇”。协同推进村级党建和民主政治建设，就是在推进村级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以确保民主政治建设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稳步前进。党组织在加强领导的过程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使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能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从而使两者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协同发展。研究这一课题，对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鄞州区协同推进村级党建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近年来，鄞州区围绕协同推进村级党建和民主政治建设开展了行之有效的 work，探索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1、实施民主选举,不断扩大村两委会成员的群众基础。随着以村民自治、村务公开为主要标志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日益推进,农村广大党员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农村原来习惯的传统选举办法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党员群众的要求。对此,我们把在民主选举基础上加强村级班子建设,作为协同推进村级党建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农村党支部、村委会选举方式进行改革和探索。在村党支部选举上,从1998年试点开始,我们运用“两推一选”方式进行党支部选举,在2002年上半年村党支部换届中全面推行,全区共有566个村(渔业社)党支部运用该方式进行了支部换届,占村党支部总数的84.3%,分别有10842名群众和13775名党员参加“两推一选”。具体工作中,我们坚持扩大群众参与面与加强党的领导有机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让群众对支委候选人有发言权、推荐权、测评权,明确参加推荐的党员人数一般要超过应参加会议人数的80%,村民代表等群众代表人数要超过应参加会议人数的2/3。又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严格支委任职条件,从政治条件、能力条件、年龄文化条件等方面对候选人予以限定和审查,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和道德品质上予以严格把关,使选举产生的党支部班子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达到党委、党员、群众“三满意”。在村委会选举上,我们同样在加强党的领导前提下,运用“海推直选”方式来扩大选举民主。重点是把握好了“六关”:一是把好村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推选关,明确村党支部书记经法定程序推选为选举委员会主任,体现村级党组织在换届选举中的领导地位。二是把好选举登记关,普遍做到不重、不错、不漏登,保证选民的选举权利。三是把好村民小组、村民代表关。四是把好村委会候选人的直接提名关,着重宣传村委会成员的任职资格条件,引导村民推荐优秀人才。五是把好村委会正式候选人的确定关,严格资格审查,让村民信得过,政治上靠得住的党员和优秀村民选进村委会班子。六是把好正式选举关,普遍

采用召开选举大会或设立中心会场和固定投票站方式组织投票,严格控制流动票箱,规范委托投票,设立秘密划票处,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增强选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这一选举方式,一方面优化了村委会班子结构。从2002年全区599个村选举结果看,村委会成员中党员1327名,占74.4%,村委会主任是党员的486名,占主任数81.8%,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的485名,占27.2%,平均年龄为43.9岁,有一大批政治素质好、能力水平高的农村优秀人员被选进村委会班子,巩固了村级组织基础。另一方面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提高了农村基层民主法制意识。据统计,全区23个镇乡共有441121人参加了投票选举,参选率96.8%。选举竞争十分激烈,如洞桥镇应选主任26名,被提名推荐为主任初步候选人的有611人,应选委员52名,被提名推荐为委员候选人的有1335人,当选主任和委员比例各达23.5:1和25.7:1。尽管竞争激烈,但未发生重大差错和问题,也未引起村民集体上访和群众性事件。

2、完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使村务管理日趋科学化。根据广大农民群众要求参与村务事务决策、管理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实际,我们把促进村党组织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广大群众关心和参与村级重大事项的积极性,使村级每项决策更有群众基础,更加科学合理,作为巩固村级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和推进村级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块重点工作内容。建立健全“三委会”决策制度和重大村务公开制,把决策权交给群众。明确界定了包括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村民(社员)代表会议和村经济合作社监察委员会(民主理财小组)等在内的村级组织的地位、作用和主要职责,制定出台了《村级民主议事决策实施细则》,对村三委会联席会议、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责权限、议事范围、会议程序、执行和反馈等内容加以明确界定,重点抓好“三会决策”的贯彻,即各个村的重大事项决策必须采取村三委会提方案、党员大会